

八堡海塘工程的建造

陈月江

近年来，钱塘江潮水最大的地方，已由原来的盐官镇移到镇东八堡地方。这里小地名叫“大盘头”，由于地形冲伸入钱塘江中，潮水几经碰撞，刚好冲击在八堡地方，所以在这里筑了一座大盘头，以减轻潮水冲力，保护塘身。

由于每昼夜潮水袭来，八堡首当其冲，所以历史上坍塌海塘也是这一带地方居多数。1917年、1918年间，也即七十年前，八堡一带江边突然涨起一片沙滩，政府每年拨发下来用以修建海塘的大笔经费，这几年间也没有动用。因此，当时担任海宁县塘工局长的唐某，便建议省厅，将几年来积余的修理海塘经费，建造一条藏镶大塘，作为预备海塘，万一外面石塘坍掉，亦可抗御潮灾。当经省报中央批准，动工兴建。

藏镶海塘又称水泥海塘，俗称洋灰大塘。因当时水泥还没普遍使用，原有海塘都用石砌。这条新筑的塘采用当时的先进技术，用高质量的水泥浇灌，地点就确定在潮水冲激最猛烈的八堡一带。原计划建造长度为二十个字号（按：为了便于管理，海塘以《千字文》中的字序编号，每二十丈一个字号），结果只建造了十八个字号。藏镶海塘由“车”字号起，到“旦”字号止。这十八个字号是：车、驾、未、

轻、盘、溪、伊、尹、佐、慈、阿、衡、奄、染、屈、阜、微、旦……，尚存薄、菅两字号未筑。整条藏镶大塘，底宽7公尺，面宽3.5公尺，高7公尺，每层1公尺。从1920年动工兴筑，到1923年冬完成。现在，外面原有的石塘早已坍掉，这一段海塘作为正式海塘，仍在继续发挥它的保护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作用。

抗战胜利后修筑海塘

陈月江

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，海塘无人管理，又有不法分子拆坏海塘，偷盗椿木，致使海塘坍塌严重，造成潮水过塘，淹没庄稼，内陆河浜亦被泥沙淤塞。当时虽亦有部分地方由国民党政府组织力量抢修，但限于财力物力，问题仍然不能得到彻底解决。

抗战胜利后，海塘坍塌的情况仍然不断发生，国民党政府始集中力量，积极修建海塘。当时坍塌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在八堡、九堡、陈兴港一带。工程采用招标方式。后由上海国华工程营造公司投标承包。施工规模很大，达到半机械化。所需石子、石块在尖山开采，设轻便铁道，由小火车直接运送；同时在八堡、九堡工地及丁桥镇

带临时搭造百来间木构流动房屋。又在尖山及盐官镇搭造部分较高的金属构成的流动房屋，用以修理各种机械。还装上电灯，按上电话，自备火力发电机。打桩用打桩机，挑土、堆土用推土机、捻泥机等设备。工人约有三万人，再加本地民工，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小的劳动队伍。

在附近的乡村小集镇之间，骤然间猛增三万人口，这使得丁桥、诸桥等处的店铺生意兴隆，农村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。原来沿海塘这一带地方，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海宁境内受灾最严重的地区，尤其是八堡、九堡一带，许多农民被杀害，房屋有百分之九十被烧毁，通过这次修海塘的三年多时间，沿塘一带农民生活大为改善，大部分人家还盖起了新屋。所谓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，这就是修建海塘直接给附近农村带来的利益。因此，在旧社会本地有一首民谣：“塘锣响，饭米香，大鱼大肉满肚胀。三担一挑回家转，种好田地喂猪羊。”所谓“塘糊涂”就是这样。

这次国华公司建造海塘，是采用坦坡方式，东边为1：6比例；西边为1：3比例，建造总长度为1620公尺，并又伸向海中64个挑水坝，目的是为了阻拦沉沙，减轻潮水冲力。最大的挑水坝是“景”字号（注）的一个，它伸向海中1200公尺，采用沉箱施工，小的挑水坝只有80公尺和100公尺，用抛石施工。海塘即修建，使

得附近人民得以免受“潮灾”的威胁。

(注)为了便于分段管理海塘，用《千字文》编号，从“天、地、玄、黄。”起，每个字号为20丈丈量尺，折合公尺约64公尺。

抗战前海宁全县土地清丈工作

许以恒

抗日战争以前，海宁曾进行一次全县土地的清丈、整理、登记工作。这一工作是1933年江恢阅任海宁县长期间开办起来的，江恢阅原来在黄岩县搞过清丈，有着这方面的经验。他随任带来一批清丈工作人员，如柯冶铁担任练习组组长（一年后调为检查组长），郑国学和一个姓程的担任清丈组组长，其余的人就是清丈员。

清丈处正式成立后，以当时的县农民银行经理顾达一为主任（兼职，不支薪），由陆军测量学校出身的查济澄（硖石人）担任清丈队长。土地清丈首先利用镇海塔为三角点，展开图根测量，作为户地清丈的数据，然后按图根进行实测。清丈人员，决定公开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当练习生，从竖标杆、拉篾尺学起，一块图板三个人工作。一般练习生经过实地工作与钻研，在不长的时间里，便能掌握图板测绘，升为清丈练习员。许村、许巷、沈墅等乡

的户地清丈原图，就是练习员所测，精度合乎要求。

为了节省开支，有些测绘用具是采用土办法动手自制的。如用篾片接成30米长的篾尺，牢固耐用，无伸缩性，因而在测量时准确度高，有布卷尺所没有的优点。

次年，成立了求积组，任用汪达章为求积组长，招收具有高小程度而会珠算的女青年二十余人，经过短期培训，便能掌握求积仪，求出亩面积和总结出全图的总面积。在工作最紧张时，仅仅野外作业人员就有二百人左右之多。

清丈的经费，是从田赋中附加带征的。开办之初由省地政局拨款（其时局长为洪济川），1934年遇到特大旱灾，全县绝大部分地区颗粒无收，经当时行政院批准豁免田赋。因此，带征的清丈经费也因之落空，影响所及，连清丈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来。但是，内外的作业，并不因欠薪而停顿，员工们照常工作，不闹风潮。这是由于领导人平时能关心青年人，深得员工们的信赖之故。当时练习生的月薪虽然只有十五元，但物价便宜，个人生活足以自给。

1937年初，清丈外业告竣，所绘之图，正欲设点公布，让业主认图，突然“七、七”事变爆发，抗战军兴。十一月间，日寇在金山卫登陆，长驱直入，海宁地处要冲，有关部门急将原图装箱，搬运到绍兴平水，租屋贮藏，派王家熊负责保管，并安排其全家迁到平水避难。以后又辗转易地保藏，历尽艰险，最后终于使这一批

珍贵的详尽的实测资料，得以保存下来。

抗战胜利后，清丈原图运回海宁，基本完好。解放以后，成为本市仅存的一整套珍贵历史档案资料。原图分别为实测的二千分之一（山区）、千分之一（乡村）和五百分之一（城镇），全部共计50×40公分大小三千余张，其详尽和精确程度为从来所未有，而大面积的在全市（县）范围内有这样完整的资料保存至今，则在全国来说，恐怕也是不多见的。

硖石的宁波会馆

邬克俊

硖石镇地处沪杭铁路中段，水陆交通便捷，商业相当发达，尤其是丝业、米业、土布业更为突出。辛亥革命后，硖石建有布业公所（下东街），有的行业还建立同乡会兼会馆。例如徽州会馆、绍兴会馆、金华会馆、宁波会馆等等，这些都是外地人来硖石经营商业发迹而后建造起来的。当时宁波会馆范围较大，因为宁波人来硖石经营的是中药材，其中最有名的，要算万源、广生、久六、吴采芝，专做批发，称为药材行，惟有吴采芝批发兼营门市另售配方，又如天生堂、长生堂这两家药店，专营另售配方，而这两家药店的

老厨、职工、学徒，以至厨师都是宁波人。硖石镇当时13片药店，大部分都有一至三人是宁波人，由于生意兴旺发达，就由各业主筹资建造了一所宁波会馆，地点在北长埭（即今长埭路）。这所会馆走进墙门，朝北建造了一个颇有气派的奏台，两旁是很长的走廊，通向三间正屋，一间是看管会馆的人居住，一间是办理会馆事务的人居住，正中的一间是供奉一尊“药王菩萨”（按：旧时药业尊唐代名医孙思邈为“药王菩萨”，也有的是供奉远古时曾尝百草的神农氏）。后面有几间披屋，是停放棺木用的。当时宁波会馆主要的活动有以下几方面：

一、每年农历四月廿八日，称为“药王菩萨生日”，所有的药店、药材行的人员，都要烧香点烛，以表庆祝。那一天，奏台上锣鼓喧天，奏乐唱曲之声不绝于耳，鞭炮的声响终日可闻，附近来看热闹的人亦络绎不绝。不仅药材行的店员、职工都要去朝拜庆贺，连老厨、经理也未能例外，而且要朝“药王菩萨”三跪九叩，更为认真。凡是去庆贺的人，都由专人招待，供应“生日面”，下午并供应点心。

二、凡是宁波人到硖石来，身无分文，或是病了，遇到意外困难，可找到宁波会馆，由会馆供给一宿两餐，并发给路费，使之返回宁波原籍。如或病死，由会馆代为料理后事，买棺成殓；有家属的则

由会馆资助办理丧事。无力埋葬的，暂时停放在会馆，定期分批运回宁波。

三、宁波会馆也相当于药业公所，公议药业的商品价格。当时各行各业的商品都由同业公议，药业的商品价格最易混乱，所以亦订有同业公议的价格。如果发现有那家药店抬价，或以劣充好，就召集各药店负责人商议罚款，或在东山戏台罚戏一台。负责管理会馆的人由药业中人自行推选。

“海昌公所”与“海宁贷学金委员会”

清代光绪末年，在上海的海宁同乡已有一个名叫“海昌公所”的组织，地点在上海闸北海昌路，是为同乡人办理死后殓殮、埋葬或送灵柩返乡等事宜的群众性组织。据我回忆，解放前的主持人有：沈志云、徐申如、花鲤庭、杭卓英、施少初、周午三、查仲坚等。过去旅沪同乡集会，往往借用公所地点。抗日战争中，海昌公所的房屋毁于战火，该组织也就此瓦解了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海宁同乡逃亡来沪的络绎不绝，子弟失学者日增。同乡人中由陈已生、严谔声、王哲安、朱肖琴、周午三、朱筱和、朱桂林、施绳祖、徐启文、管锦康、王渭耕等发起，并有朱静

潘、朱成和、朱克闻、李元善、吴崎青、范少初、张正学、徐玉书、徐申如、上官钱江、赵尘俯、孙信久、顾允中等赞助集资，办过“海宁贷学金委员会”。抗战八年中，先后培养中小學生約百餘人，至抗战胜利第二年止，对同乡子弟有过一些帮助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沪海宁同乡徐永祚、徐申如、周午三、王渭耕等还曾经募集基金，帮助流亡在沪的同乡返乡，两次共七百余人。这也是为同乡人做的一点好事情。

王渭耕口述

长女王芸青代笔

解放前硖石的茶馆与书场

邬克俊

在解放前，茶馆店在硖石镇上最盛时有120余家。茶馆店的营业时间没有规定，每天从早到晚，来吃茶的人川流不息，可说是贫富咸宜、人人称便的地方。主要的顾客，是上街来的农民，在卖掉了农副产品、买好家中所需要之东西之后，休息喝茶的地方。

但是，旧时硖石镇上的茶馆店，与其他集镇的茶馆店情况也不

尽相同。现将当时具有特色的茶馆店，就我记忆所及，分述于下：

下东街的“同福园”，上午去吃茶的，是附近的老年居民和近郊的农民。他们在那里谈天说地，讲讲“山海经”。下午十二点过后，吃茶的人就截然不同了，这里有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党政人员，有小学教员，也有报馆的访事员（记者），还有一些虽然有一定文化程度，却无正当职业而游手好闲的人，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，服装也形形色色：有的西装革履，有的长袍马褂，有的里面穿西装裤，外面穿长衫，“中西合璧”，还有的手拿“司的克”（手杖），完全是一副官员、绅士气派。

又如“三和馆”茶店，开设在北石路，现在中医院挂号的地方，到那里吃茶的人都是爱好养鸟的。每到午后，各自拎了一只至三只鸟笼，到那里吃茶聊天，共同赏玩。有时还约好日期，相互斗鸟。每年中秋节过后，这里还添了一种斗蟋蟀的玩意。旧时硖石镇上爱好养蟋蟀的人相当多，到时候都要拿去一决胜负，并且连续多天，甚至达半月之久。

赵家汇有家叫“叙仙阁”的茶店，因地处赵家漾河埠，那里停靠着来自海盐、平湖、澈浦、沈荡、通元等地的轮船、快班船，到这里吃茶的人大部分是从外地来的。客人不论是来探亲访友的或是回家的，走进茶店只要问一声“到某某地方的船有没有”，船主人

听到是自己船上的乘客，便上前帮助他们把行李物品先拿到船里，并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开船等等，出门人非常方便。

另如仓基街西寺桥头的“宜园”茶店，到这里吃茶的人又有另外一派气氛。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穿的衣服，有的是长袍马褂，有的是长袍外面穿了一件背心，头上戴了一顶平顶的或尖顶的小皮帽，帽顶还有一颗红红的珊瑚顶珠，手里捧着一只水烟管，或者握着一支将近一公尺长的旱烟管，脚上穿的是黑鞋白袜。到这里吃茶的人大多数是戏曲爱好者，尤其是最最爱好昆曲，有时谈兴正浓，几个人就自动组合起来拍上一曲，如《西厢记》里的《拷红》、《借厢》、《长亭送别》等。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，属于生活富裕的有闲阶级。

还有西大街（现改为陝西街），有家“西雅园”茶店，有人称它“鲁班堂”。因为这家店里塑有张班、鲁班的象。据说张班、鲁班是木工、泥水工的祖师。所以外人不到那里去吃茶，去吃茶的人都是泥水工、木工。这些人在旧社会的社会地位低微，被称为“师傅辈”，因此一些自鸣清高的人就不愿到那里去，仿佛是“有失身份”似的。

“大富贵”茶店开设在干河街（现在农业银行储蓄所的地方），到这里吃茶的大多数是商业中人，有职工、经理、老板。有的行业在这里组织同行业茶会，凡是这一行业的人员到这里吃茶，不要付

钱(由同业公会总付)。一到晚上,各行业的人员都聚集在各行茶会上,高谈阔论,大谈生意经,或谈货源,或谈物价。有时同行业研究同业公议另售价格或批发价。既在这里交流市场信息,也在这里商议有关业务。

又有一家“见山楼”茶店在花园桥堍,背后靠近西山,前面可望见东山。在这里吃茶的人大多是摇船迎送各地顾客的。有些坐火车来的人要到马桥、袁花等地,就到这里雇条船坐了去。在这里吃茶的人还有些是旧社会的关卡人员。当时附近还有个烟酒公卖局,他们就以缉私为业。因为当时桐乡的烟叶,严墓的烧酒等从产地运来,大多数要经过这里,或是做税,或是讨情行贿。

旧时硖石镇上的书场有6个。最早是“南湖厅”书场,以后又在赵家汇大木桥堍开设“颐厅”书场。这两个书场设备很简陋,场子里除了一个演唱书台位,座位很不宽敞,只有两张长长的板台放茶壶用,听众坐的都是长条凳或短板凳。但是,来个演唱者如果是牌子响当当的话,下午一场和晚上一场仍然场场客满。

后来相继开设的有“如意阁”、“凤凰楼”、“民乐”书场等。“南湖厅”、“颐厅”后转业为茶店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由孔世宽开了一个“高乐”书场,由于该场请来的大多是一、二等角色。加上服务态度热情,场子宽敞,坐的是长长的靠背椅,而且茶票买不

买都可以（别的书场进去听书一律要带买茶票），所以生意格外兴隆。后来“如意阁”、“凤凰楼”、“民乐”书场都改为茶店，高乐书场一直开到解放后硖石书场开办后才停业。

1926年清明夜的硖石大火

徐家麟

1926年4月5日（农历清明节）这天夜里，硖石平桥堍的一家名叫徐义昌的铜匠店突然失火。火灾因锡箔灰死灰复燃引起，因为当时社会崇尚迷信，清明扫墓祭祖等都要焚烧锡箔。大火从这里烧起，一直延烧到仓基新埭直至惠力寺（西寺）头殿以西张姓民房为止。在近代史上，这已是硖石镇第三次大火。这一次火灾，总计烧去房屋达1960间。

由于这一带大多是住宅户，而且以小户人居多数，所以灾情严重，火灾之时，哭声震天。当时上海《申报》曾刊登了以《硖石大火》四字为标题的新闻报道。

大火发生后，即由硖石地方士绅徐申如等专程跑到上海，和海宁旅沪同乡会负责人徐永祚商量，以海宁旅沪同乡会名义，向各界发起募集赈济灾民的款子。首先向犹太商人哈同募到3000元，

其余不论多少，共计募集了当时通用的货币1万多元，用以救济硖石火灾的受灾户。

与此同时，为了接受三次大火教训，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灾害，又由硖石人吴欣木（曾做过杭州市警察局消防队长）出面，向上海震旦消防器材厂购买了一台12匹马力的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消防车，所费的7000—8000银元，硖石镇商人何景清首先捐助500元，其余都由地方士绅、商店行号筹集负担。并在原广生药材行门口安排了一间停消防车的房子，聘用了一名姓翁的司机。这样才算减轻了人们的思想负担。

来信摘要

《海宁文史资料》第23期《国民党海宁县党部的初创时期及其早年组织的演变》一文，对末尾一段，据我所知，与当时情况颇有出入。兹就我亲身经历，叙述如下，以供参考。

1935年4月，我和王家熊、金申禄、吴维浚4人，经国民党海宁县党部选拔，被保送到国民党浙江省党务人员训练班受训。当时初步了解到县党部常务委员是吴雨耕，执行委员詹咏泉、陈东屏、张

帆，监察委员顾达一。我们4人在“党训班”受训（个月毕业后，分发到海宁县党部，安插为民运助理干事（后来4人转入其他单位工作）。当时县党部正要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，由总务干事吴观澜起草《工作报告》，定稿后交给我刻蜡纸、油印、装订，所以对有些情况还能记忆。

以后我同周围同仁渐渐熟悉起来，知道詹咏泉兼组训干事，王敏是组训的助理干事，俞祥林是宣传干事，一个绰号叫“大鼻头”的是录事（姓名已忘，崇德人），金寄馨是省党部特派的中统调查员，加上总务干事吴观澜和我们4人，经常是10个人共餐。

1935年11月上旬，全县党代大会开幕，会期三天。在最后一天下午，正要选举执监委员之时，突然提出一件临时提案：“罢免吴雨耕常务委员之职”。会场上顿时引起轩然大波，吴雨耕面红耳赤，叨叨不休发言自辩。但大会还是通过了，改由陈东屏为常务委员，詹咏泉、张帆为执委，顾达一为监委。

吴雨耕的妻子是县妇女会会长，也是党代会代表之一，同时挨了批评。其后他俩就在盐官南大街开设文具店，并主编《新海宁报》，与国民党办的《海宁民报》（陈东屏编）分庭抗礼。吴雨耕的文具店置办了脚踏印刷机，《新海宁报》自编自印，并承接铅印业务，营业发达，也可说是“塞翁失马”了。

许以恒